

国外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

陈雪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关键词: 性别研究; 移民研究; 女性移民; 多元交织性

摘要: 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是伴随国际移民女性化趋势发展起来的。文章回顾了移民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发现女性移民到80年代以女性移民为研究主体,再到90年代以后移民研究逐渐走向性别主流化和多元交织性的过程,并认为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使两个研究视阈相互渗透,不仅分别推动着性别研究和移民研究向纵深发展,更促使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分支的介入与研究融合。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6)04-0120-09

Overseas Research on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Immigration

CHEN Xue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Yunnan Province, China)

Key words: gender study; immigration study; female immigrants; intersectionality

Abstract: A perspective of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immigration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feminization of immigr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hanges in immigration research from discovering female immigrants in the 1970s through establishing a focus on female immigrants in the 1980s to mainstreaming a gender perspective and a perspective of intersectionality. It recogniz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erspectives has not only enriched research on gender and immigr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but also enhanced the introduction of other perspectives and social inquiries.

国际移民是指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口^[1]。伴随着全球化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移民研究因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成了最具争议的研究之一。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16年一份最新统计显示:全球移民数量从1980年的10300万到2010年增长至21400万,30年来整整翻了一番。近30年来,国际移民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球人口的增长速

度,并援引联合国相关报告称,到2050年,国际移民人口将超过4亿,比2010年再翻一番^[1]。

一、国际移民理论及移民女性化趋势

全球化语境下,以劳动力移民为主的国际迁移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改造着人们的知识结构,重塑了各国人民的生活观念和人生向往。其次,来自各国内部的政局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带给年轻一代就业

作者简介:陈雪(1982-),女,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2015-2017年教育部国家公派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移民研究。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压力和新的从业憧憬,促使他们走出国门求学或者寻找待遇更好的工作。再次,来自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的经济势差,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变化使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从南半球迁移至北半球。与此同时,地区内部之间的流动、如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亚洲地区内部的人口迁移也络绎不绝。

无论是输出国还是输入国,社会结构、国家边界、国土安全和政策治理都受到大规模国际移民的影响。因此,国际移民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成为一个备受关注也充满观点交锋,集合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和法学等学科门类共同聚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并不断呼唤和吸纳新的学科和理论研究框架介入研究^{[2](P167)}。澳大利亚学者 Stephen Castle 等人将国际移民现象描述成一个“移民时代”(the age of migration)的到来,指出了移民研究的时代性、紧迫性,并将现有的移民研究划分为两种范式:“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理论范式和“历史—结构”(historical-structural)理论范式^{[3](P27)}。功能主义研究范式主要包括“推—拉”理论、新古典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研究范式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系统内的其他因素如个体主动性等则类似于某个器官,这些器官总会不断地调整自身运行,以便适应整个有机体的平衡,并使其良性发展。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将国际移民视为一种积极的现象,并认为移民通过行动可以推动自身和社会趋向平等化。“历史—结构”研究范式的理论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上,衍生出全球化理论和市场分割理论。这一研究范式将国际移民现象视为伴随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对称发展,产生的导致结构不平等性的再生产。国际移民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却造成了移民输出国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地理空间结构的不平等。

两个研究范式代表了国际移民研究的两极化观点,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忽略了国际移民形成的历史

原因,以及主权国家及社会结构在移民过程中的作用;“历史—结构”研究范式则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结构,将资本主义视为解释国际移民的全能因素。基于这两个研究范式的片面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系列聚焦于移民动机和移民类型的中观和微观研究开始兴起,包括跨国主义理论、社会网络、移民系统和移民转型等在内的新理论蓬勃发展,这些观点部分继承或者糅合了功能主义与“历史—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的观点,但更关注移民个体在移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形成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移民研究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区别于20世纪70年代以承担家庭生计的男性为主的移民性别结构,女性移民人口从80年代起出现了剧增,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国际移民的女性化趋势(feminization of immigration)。200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UNPFA(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ssociation)一份名为《通向希望之路:妇女与国际移民》的报告中称:女性移民已基本占据了国际移民的半壁江山,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不再只是作为家庭成员迁移,而是独立的移民者,女性移民形成了一条虽“沉默却强劲浩瀚的河流”(silent and mighty river)^[4]。Stephen Castle 等学者还将女性化趋势列为当代国际移民发展的六大趋势之一^①^{[5](PP16-17)}。女性移民的增多,使得许多学者,尤其是妇女学和性别研究的学者将视角转移至这一群体,从当代移民历史中重新“发现”女性移民的身影,从研究女性移民在移民过程中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贡献,逐渐转向国际移民的性别分析视角,并开始引领移民研究中的一股“潮流”(tidal wave)^[5],逐渐成为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移民的女性化以及随后的移民性别化研究充分运用国际移民研究的两个研究范式中的相关理论,如既采纳功能主义范式中的输出国与输入国政治经济等综合的“推—拉”因素,也通过新马克思女性主

①《移民时代:当代世界的国际人口流动》(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对当代移民特征和趋势的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移民的全球化;(2)移民人潮的方向转化,如欧洲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地变为主要移民输入地之一;(3)移民类型多元化;(4)移民形式的分化,指的是一些国家由传统的移民输出国正转变为兼具输出与输入特征的国家;(5)移民的女性化趋势;(6)移民问题的政治化。

义的连接,运用“历史—结构”范式中的全球化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来分析移民性别化趋势产生的原因。在描述移民迁移后的生命经历和生活状况时,学者的观点也呈现出两种对立的观点立场:一部分研究者强调移民性别化趋势中处处暴露的剥削性和不平等性,认为女性及其他处于弱势的性别化群体在移民过程中总是显现出不可避免的脆弱性,需要面对人口贩卖、暴力、歧视、疾病感染等社会风险;另一部分学者则充分运用跨国主义理论、移民网络和人力资本等理论积极评价女性以及其他性别化移民群体在迁徙中建立的社会网络及其功能,并对个体表现出的能动性(agency)和自主性(autonomy)给予了充分肯定^{[6](P113)}。

学者 Nancy L. Green 认为,近 30 多年国际移民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从只研究男性移民、到“发现”和研究女性移民、再到移民研究的性别化过程^[7]。这也是一个性别研究和移民研究互动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迁移可视为一个性别化的流动过程,性别也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成为流动的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别关系,就与其他身份、社会关系一样,在跨越地理、国家主权边界的同时,也面临着重新建构和不断转型。

二、“发现”与研究女性移民

1889 年,提出“推—拉”理论的早期移民研究者雷文斯坦(Ravenstein, E.)通过观察后撰文认为,移民距离是决定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产生的主要原因,与男性相比,短途移民的女性更多,但女性很少进行长途移民^[8]。这也被认为是可追溯的有关移民最早的性别论述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及交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国际移民,但雷文斯坦关于女性移民的这个论述却没有像他那个直到今天还被研究者反复运用和探讨的“推—拉”理论那样引发争论,就连在美国这样的传统移民输入国,也是移民研究最活跃的国家,也没有学者对他那个既落伍且错误的论断进行反驳^[9]。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理论根基还不牢固与深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参与学术研究的女性学者数量还较少,掌握研究话语权的男性很少专门地关注女性移民。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

期内,女性移民始终游离于移民研究的中心之外,仅有少量研究者尝试在移民研究中“加入妇女搅一搅”(add women and stir)使整个移民研究看起来更客观,更具全景化,从而构成完整的移民社区研究^{[10](P22)}。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性别研究的发展,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才开始真正关注女性移民群体。同美国学者 Nancy L. Green 的观点相似,欧洲学者 Laura Oso 等人也认为对女性移民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渐进过程,并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对女性移民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70 年代初期以前的研究空白时期;1974 年到 80 年代初的发现女性移民时期;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女性移民研究的大量产生时期^{[11](P11)}。

(一)刻板的“尾随配偶”形象

虽然国际移民研究理论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百家争鸣的理论体系。但传统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工业化与资本和劳动力发展的不均等、不对称是引发移民的根本原因,也是移民迁移的方向总是从南半球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向北半球相对富裕的发达国家流动的引力^[7]。以美国为例,19 世纪中期,伴随美国东部城市向乡村蔓延和铁路网络的扩张,大量北欧移民迁移至这片新大陆的旧金山一带,成为最早一批华裔劳工。在漫长的时期里,“移民”等同于具有明显体力优势的男性劳工,这些男性移民大多扎根于移民接收国的工厂、矿山或者田地里,从事重体力工作。这一早期的移民性别化特征是造成女性移民成为研究盲点的重要原因。

大量性别研究者和其他移民历史学者、人口专家透过文本分析认为,1974 年以前极少的关于女性移民的论述中,这一人群几乎都是作为“尾随配偶”(trailing spouse)被描述的^{[12](P22)}。“尾随配偶”身份既是当时女性移民的实际处境,同时也通过经验性的观察研究被不断强化和刻板化。美国学者 Mirjana Morokvasic Source 在 1984 年发表的文章《迁徙的鸟类中也有女性》中认为父权制家庭模式的普遍存在是造成这种刻板印象的根源,同时也是基于对男性社会生产功能和女性再生产功能的二元划分而产生

的^②[13]PP886-907)。“尾随配偶”的身份将女性移民置于一种依附地位,这种对女性移民的刻板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阻碍了对女性移民身份变迁的认识和解读,忽视了女性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发展(同时对移民输入国和输出国)中的贡献,否定了女性和男性在移民过程中的平等性。当女性移民被固化为同行男性移民的随行家属时,就意味着其性别身份被次等化(Secondary),并具有了依附性(dependency)^[11](P12)。

斯科特(Scott, C. V.)认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现代性(modernity),女性依附地位(dependent status)的刻板塑造是由于她们被排斥在现代性之外^{[14]P53}。现代性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产生的,它代表了城市生活一种理性的、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它激励男性参与竞争并取得成功。在这种现代性中,男性占据了城市的公共空间,而女性则被迫与私人领域、农村或者部落空间联系在一起,被限制在自然性中,不仅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被默认为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另一方面由于移民的流向是从发展缓慢的南半球国家流向富裕的北半球,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使移民输出国沦为经济发展的外围地区,也造成了南半球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依附性,但即便是在这种依附性中,由于发达国家对男性移民劳动力的需求,也使男性移民比女性移民更具移民优势。因此在这种双重依附语境下,女性移民在早期的研究中要么难见身影,要么成为沉默的跟随者。

(二)“显露身影”的女性移民

1974年到1975年欧洲正式对移民采取关门政策,男性劳动力移民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欧洲国家了,以家庭团聚为名的女性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移民群体之一,并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与此同时,在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提出性(sex)与性别(gender)区别的20多年之后,“性别”一词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社会科学家们采用问卷调查、民族志、档案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法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性别差异和性别关系进行研究,大

量有关性别功能的文章及著作在这一时期面世。这些研究从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家庭等方面集中分析了社会对两性功能差异的分配和建构。一部分研究侧重于探讨公共/私人领域的划分,认为女性更多地被限定于私人领域并由此导致了其更低的家庭、社会地位和价值。另一部分研究着重探讨文化/自然的压力是如何建构性别差异的^[15]。公共/私人领域和文化/自然这两组二元对立的分析法在反复强调两性差异的同时,还被视为对压迫女性的传统观念的一种回击^[5]。

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学者们开始追问新的问题,他们将聚焦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工,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移民比较集中的纺织、制衣,以及家政工作等行业,关注女性移民劳工受到的压迫。从最早的只是“加入妇女搅一搅”到发现女性移民并关注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对女性移民的研究路径是与性别研究的发展一脉相承的。

(三)被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

由于传统移民接收国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趋势以及服务行业的兴起,使得移民国家对移民的需求类型发生了转变,护士、家政服务和保姆行业劳动力缺口的预设目标人群为女性。于是,数量庞大的职业女性(working women)移民成了备受关注的对象,女性移民的性别优势开始被察觉。研究者们一方面将移民的女性化趋势作为描述国际移民现象变化的主要特征进行阐述,同时女性移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逐渐被认可。还是在那篇著名的《鸟类的迁徙中也有女性》中,作者首次通过强调需要重视女性移民人口递增现象,进而呼吁重视女性移民在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和经济贡献^[12]。

由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研究倾向于一种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大量的人类学者重点观察移民者的家庭以及更大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对移民亲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查研究,研究者们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是认为移民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范畴的问题,更是一个在性别化和亲缘关系主导的意识形态、习俗

^②Morokvasic 的这篇文章是对1979年一位男性学者 Michael Piore 的一篇移民研究文章《迁徙中的鸟类》(“Birds of Passage”)的回应,被认为是当代女性移民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述。

以及实践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社会文化过程^[16]；其二 是认为尽管宏观结构的变化(全球化发展)是解释国际移民现象的主要动因,但在具体的移民家庭内部,决定谁能够移民、谁留下、移民定居以及返回等关键问题时,家庭中性别和长辈的权力成为决定性的力量^[17]。通过对家庭、亲缘以及更大的移民社会网络交织场域下的研究,女性移民在其家庭中的作用得到发现和肯定。这种作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移民女性在移民家庭内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口生存和社会再生产方面的贡献,这也成为亚洲地区学者对区域范围内跨境婚姻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另外,研究者关注移民女性向远在祖籍国的原生家庭寄回汇款(remittances)的作用,这些汇款既包括金钱和物质,也包括她们通过移民建立起来社会关系网络和其他社会资本,研究者强调这些社会性汇款对于母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女性移民的研究进程,可以说同时伴随着移民女性化趋势和性别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向前推进。劳动力市场和移民接收国的政策改变是导致移民女性化趋势的两个最重要因素^[7]。首先,全球化趋势下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化分工,使得更多国际女性化的工作机会产生,女性由此具有了独立移民的机会;其次,各移民接收国陆续采取的移民关门政策和同时采取的移民家庭重聚政策在将男性移民阻挡在国门之外时,女性却成了移民政策调整的受惠者,因此很多学者也认为移民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18]。

女性移民的剧增趋势,使得她们作为“尾随移民”的刻板化印象逐渐改变,女性移民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贡献逐渐被发现和认可。透过对亲缘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的微观和中观观察,性别研究者强调家庭中的性别化权力和代际权力在个体移民决定中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观察到女性移民在移民社会网络构成中的角色扮演和作用以及女性移民对移民输出国和原生家庭的反哺。

但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前的女性移民研究,学者 Hondagneu-Sotelo 指出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部分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仅仅只是把性别当作一个变量来比较男性与女性移民模式

的差异化;二是大多数研究从“不关注女性移民”跳跃至仅“关注女性移民(only women)”,这一将女性视为性别化主体的方式实际上却将女性移民推入更加边缘化的状态;三是早期的女性移民研究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性别化影响,却将劳动力市场、社会制度等视为性别中立,未能将性别当作一个全面的社会结构来分析^[19]。

三、从女性移民研究到性别与移民研究

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的互动是建立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中移民趋势的动态变化以及移民研究与性别研究同时不断向前发展之上的。

一方面 移民女性化趋势不仅使女性从“深居闺阁”或者“影子伴侣”的传统形象挣脱出来走向国际舞台,更使其他移民性向问题,如同性恋移民、跨性别者移民(transgender people immigration)等少数群体的研究也成为了研究焦点,移民的性别化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关系到性别身份、权利、文化和政治的“显学”,亟待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

另一方面 随着性别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以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斯科特(Joan Scott)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更具开放姿态地将性别视为一种主体化的过程,而非一个被赋予或安排的身份^[5]。性别逐渐被认为是人们赋予两性生理性区别的社会性意义,它是一项人为的发明(human invention),并用其来控制我们的行为与思想,但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进程(ongoing process)^[20]。人们从事“性别化的工作”,通过实践,来达成两性关系的妥协与共识。性别研究也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现实主导(praxis-oriented)的研究视角^[21],将性别意识、性别认同和性别关系视为一种流动的而非一成不变的状态。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性别分析开始注重在方法上与结构主义和实证研究相融合。性别研究这一风格的转变也体现在对移民群体的研究上。

Hondagneu-Sotelo 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研究是一个从移民女性研究转至分析移民性别化的过程^{[19](pp20-42)}。研究者开始逐渐摒弃那种仅以男性移民或者仅以女性移民为中心的研究,认为性别作为构成人类关系的一个因素,虽然是最主要的,但不是

唯一的。从 20 世纪最后 10 年到 21 世纪的 10 多年间,性别成为移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析门类,研究者将性别作为权力关系的表征与透镜,去审视移民迁徙过程中的体系、社会准则、政治结构和身份认同问题^[22];与此同时,性别研究者将移民的阶级、种族和民族、年龄等其他权力和差异与性别粘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强调性别的动态属性,认为性别与其他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以及个体的过去、现在等主体性因素一起互动变化,应将性别置于具体的社会场域中探讨。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更加紧密,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移民研究性别主流化和性别研究的多元交织性两个主要特征。

(一)移民研究性别主流化

移民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背景的研究,性别研究也是如此。当今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基于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移民研究都强调将性别放入移民分析的中心位置^[5],这不仅促使移民研究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也使移民研究与性别研究在多学科交叉的语境下互动更为密切,并加强和发展了各自的理论。

基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化特征下,女性移民参与有偿家政劳动、家庭护理等现象引发研究者的兴趣。大量以“护理工作”(care work)、“全球护理链”(global care chains)、“护理用工短缺”(care deficit)为关键词的文章出现,妇女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被反复提及,却引起一些学者担忧,认为这有可能又一次导致女性移民作为社会再生产劳动力形象的重新刻板化^[10]。此外,作为移民性别化关系与实践研究的成果,大量有关难民及其人权,移民主体性、身份的建构,移民的性向研究,第二代移民以及跨国主义的新兴研究也越来越丰富。其中,性别研究与跨国主义研究的结合发展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模式而颇为引人瞩目^[22]。

伴随着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学者针对“男性再造环境下”,女性在空间使用上面临的种种限制展开了研究。在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中,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分析性别在跨国社会空间中的创造、转换以及强化过程。2001 年学者 Mahler S. J. 与 Pessar P. R. 首次针对移民提出了“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

(gender geographies of power)的概念。区别于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地理学者对“家”的关注, Mahler 与 Pessar 的研究更关注移民的身份认同、地域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在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之下,她们又提出地理维度(geographical scale)、社会地位(social location)以及主体性与想象(agency and imagination)三个互相关联的概念^[22]。地理维度指的是迁移过程中,随着地理变化,性别在各个维度自动运行,性别关系和意识形态也因此被不断重新建构和重新确认;社会定位指的是个体的定位总是受到社会结构中各种历时性的力量导致的权力分层的驱使;主体性与其想象力指的是跨国主义与跨国空间不仅左右移民的迁移决定和行动,并使他们最终嵌入跨国空间中难以脱逃。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被认为是一个用于分析移民社会能动性的理论框架,通过观察移民的行动与实践,对比移民对迁移的想象和期待,分析移民性别化的社会能动性与实践^[22]。

在全球经济高速运动(hypermobility)与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作用下,国家和领土概念在次国家维度和超国家维度不断被重塑,移民聚焦的社区也被描述为民族国家政权之下“一个处于例外状态的法律悬搁场域”(a space where law is suspended as in a state of exception)^[23]。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移民输入国通过对移民人口和原有公民实施分类和采取专门的移民政策来完成国家识别和认同。大多数有关移民政策的研究都是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且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上:一是国家对移民输出和输入的管控;二是国家安全;三是移民的收编(incorporation)问题,主要包括移民的公民身份等核心问题^{[24](pp137-186)}。

性别与这三个主题紧密相关。例如,男性与女性移民会受到母国政策的影响,呈现出移民性别化的图景,移民法律本身通常也是性别化的,接收国针对移民融入的政策也会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反之,由于性别化的准则、期待和机遇导致的性别化的主体性差异也会对移民的迁移、定居或者返乡等决定和行动产生影响。区别于政治学者关注移民身份和移民政策及治理,社会学者和性别研究者往往更关注移民权利的维护以及如何使移民政策更趋向性别

平等化^[5]。尽管移民女性化趋势势不可挡,但移民过程中的“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致使大部分女性移民聚集于诸如服务业、家政、护理、娱乐甚至是性工作等几种特殊的行业,缺乏相应的社会和法律保护。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大量低技能的女性客工,为移民接收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却得不到相应的法律保护,生存和发展状况堪忧。研究东南亚移民政策的专家 Piper 因此认为:移民的政治和治理研究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当前的移民治理研究大都呼吁全球联动和自上而下的模式。但事实上,区域之间的流动人口占据了国际移民 1/3 的人数,移民治理应更加注重区域化合作,推行从下而上的治理,强调草根组织在移民治理中的作用,加强与性别研究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互动,保护女性移民、孩童、老人、难民以及同性恋移民等弱势移民群体的权利,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度^[25]。

移民研究与性别研究的互动,其意义在于研究者们意识到:移民过程是一个由各种不平等性构成的复杂社会网络,移民研究就是要将一个又一个缠绕的结打开,最终帮助移民改善处境,获取移民平等的权利。而性别作为一个研究不平等性的框架,为移民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门类,用于审视不同维度之下权力关系的跨度交错缔结,家庭、劳动力市场以及国家等维度在迁移过程中的联系和转换。性别成为移民研究的一个中心,日趋主流化,同时也使研究者们从性别出发,关注阶级、种族、年龄等其他有可能导致移民不平等性的一切因素。

(二)迈向多元交织性

关于“多元交织性”理论(intesectionality theory)的来源,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产生于美国非洲裔女性学者对其因种族和性别遭遇到的多重压迫的一种思考。之后学者将这个词用于描述某个群体或者群体中的个体在相互关联的压迫系统中的具体经历^[22]。多元交织性构成被认为是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回应。

1991年,美国学者 Crenshaw K. W. 第一次用多元交织性这一概念分析源自不同肤色、国家、群体的女性遭遇的多重性压迫^[26]。其后它被用来分析解释社会不平等性、文化差异以及民族、种族间的关系。

可以说多元交织性理论是性别与移民研究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理论观点,移民性别研究逐渐从探讨移民两性区别转至探讨移民过程中包括阶级、种族—民族、国籍与性向在内的社会不平等性的各个维度。由于社会实践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发生,由多层社会关系构成,包括了多重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移民的不平等性是一个动态复杂的模式,而不能仅将造成移民地位失衡的某一种主要因素,例如性别或者种族,作为分析移民困境的唯一解释^{[11][P18]}。身份的多重分类(intercategorical)是研究移民权利的基础。通过多维度的分析,学者们认为身份的概念化导致的分离或者附加,与各种形式的歧视叠加在一起对移民群体以及移民个体造成了多重压迫^[23]。多元交织性理论成为研究移民不平等性和歧视的一种复合式工具,可避免由简单还原主义带来的问题。

例如有研究者认为,造成移民不平等性的原因中,国籍成为造成移民与本土公民差别的最直接因素,研究移民性别化时,应该将其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考量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别、分层以及权力的联系^[27]。在利用多元交织性视角对输入国某一个特定的侨民群体(diaspora)或者二代移民的研究中,研究者也收获颇丰。例如学者 Smith 通过参与式观察,分析身处纽约的墨西哥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在对返回墨西哥与留在美国做出选择时的性别协商,以及这一性别协商过程是如何受种族和年龄因素跨切(cross cutting)和转化的^{[28][P346]}。在对美国亚洲侨民的研究中,研究者 Parrenas R. S. 与 Siu J. C. D. 同时关注亚洲侨民的种族化与性别化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距离和各种语境下的文化和身份排斥^{[29][P106]}。

移民研究的性别主流化和多元交织性研究之间并不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但是多元交织性理论的产生和在移民研究中的运用确实是由性别研究者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不仅使性别研究者的分析框架更趋向多层次和立体化,也使其他社会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更加关切性别研究视角。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元交织性理论可以看作性别和移民理论互动产生的贡献之一。

四、结语

总的说来,“性别”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

词。性别研究与移民研究的互动,是在移民女性化趋势的客观推动下,伴随移民研究和性别研究各自的发展轨迹,从“发现”女性移民开启融合发展之旅,经历研究女性移民,再到移民性别化研究的过程,互动最大的成果是移民研究的性别主流化和多元交织性。性别主流化可以视作性别研究对移民研究的贡献;多元交织性理论则是性别研究通过涉入移民研究,对自我理论的丰富化,性别研究不再将不平等性的来源局限于性别一种权力因素,而是迈向更加成熟的多元交织性视阈。二者的互动把两性作为一组相对的、流动的社会建构,将性别化的移民主体和迁移中的性别化现象、劳动力市场、身份、权利和文化、政策和治理等作为研究对象来深入分析,并同时注

重将父权制、两性关系与资本主义、种族歧视、国籍等其他阶层权力关系交织与缔连,在一个多层框架下研究移民性别化的过程和结果。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使两个研究视阈相互渗透,不仅分别推动着性别研究和移民研究向纵深发展,更促使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分支的共同介入与融合。性别与移民研究互动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在于一方面继续探讨不同形态的迁移造就了怎样的性别差异以及移民语境下的性别再造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探讨性别与其他身份分类如何重塑移民群体的内部结构及其对移民身份识别、认同及权利的影响,最终通过研究推动政治行动改变既有的性别、种族、阶级等权力关系对移民造成的压迫与不平等。

[参考文献]

- [1]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Guide on Measuring Migration Policy Impacts in ASEAN*[R]. 2016.
- [2]Caroline B. Brettell, James F. Hollifield. Ed..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
- [3]Stephen Castles, Hein De Haas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4]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ssociation(UNPFA).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6: A Passage to Hope: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R]. 2016.
- [5]Katharine M. Donato, Donna Gabaccia, Jennifer Holdaway, Martin Manalansan and Patricia R. Pessar. A Glass Half Full? Gender in Migration Studie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6, 40 (1).
- [6]AKM Ahsan Ullah. How International is International: A Study on Inter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 in Asia[A]. In *Migration in China and Asia: Experience and Policy*[C]. edited by Jijiao Zhang, Howard Duncan, Online, Volume 10 of the Ser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2014.
- [7]Nancy L. Green. Changing Paradigms in Migration Studies: From Men to Women to Gender[J]. *Gender & History*, 2012, 24(3).
- [8]Ravenstein, E.. The Laws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85, (48).
- [9]Houstoun, M. E.. Female Predominance i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30: A First Look[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84, 18(1).
- [10]Eleonore Kofman, Annie Phizacklea, Par vati Raghuram and Rosemary Sales. eds..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 Employment, Welfare, and Politics*[C].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1]Laura Oso, Natalia Ribas- Mateos eds.. An Introduction to a Global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A Focus on Gender,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A].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Gender,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 [12]Sylvia H. Chant and Radcliffe, S. A..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A]. in S. Chant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 London : Belhaven Press, 1992.
- [13]Mirjana Morokvasic Source. Birds of Passage are also Wome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84,18 (4).
- [14]Scott, C. V.. *Gender and Development, Rethinking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Theory*[M].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5.
- [15]Bettina Bradbury.Reviewed Work: Women, Work and Family[J]. *Labour / Le Travail*,1980, (6).
- [16]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 [17]Wood, C. H.. Equilibrium and Historical Structural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82,16(2).

- [18]Sarah J. Mahler,Patricia R. Pessar. Gender Matters: Ethnographers Bring Gender from the Periphery toward the Core of Migration Studie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6, 40 (1).
- [19]Hondagneu- Sotelo, P.. Gender and Immigra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Introduction[A]. In P. Hondagneu- Sotelo ed.. *Gender and U.S. Immigration: Contemporary Trends*[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20]Hondagneu- Sotelo, P.. Introduction: Gender and Contemporary U.S. Immigration[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9, 42(4).
- [21]Sarah J. Mahler & Patricia R. Pessar. Gendered Geographies of Power: Analyzing Gender Across Transnational Spaces[J]. *Identities*, 2001, 7(4).
- [22]Gioconda Herrera.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ntributions and Cross- Fertilization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39).
- [23]Rosewarne Stuart. 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J]. *Feminist Economics*, 2012,18(2).
- [24]Holifield, J. F..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In C. B. Brettell and J. F. Hollifield ed.. *Migration Theory—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C].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14.
- [25]Lourdes Benería, Carmen Diana Deere and Naila Kabeer.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J]. *Feminist Economics*, 2012, 18 (2).
- [26]Crenshaw, K. W.. Mapping the Marriage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J]. *Stanford Law Rev*, 1991, 43 (6).
- [27]Wimmer A. and Glick Schiller N..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 State Building[J].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2002,2 (4).
- [28]Smith R.. *Mexica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Lives of New Immigrant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29]Parrenas R. S. and Siu. LCD. ed.. *Asian Diasporas: New Conceptions, New Formation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责任编辑 绘山